



一毛钱的压岁钱

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。

奶奶和母亲中午就用冷水和好饺子面，盖上放着，然后就开始切馅儿。大多是白菜馅儿，那时的冬天，能吃的也只有萝卜和白菜。这一顿饺子要用最好的食材，扒掉白菜帮，选用嫩一些的白菜心，切成小丁，撒上细盐，再放在笼布里将水挤出来，然后加入五香粉、油、葱末、粉条、炸好的豆腐丁、煎好的鸡蛋碎拌匀，一切准备停当，就可以拉出大案板揉面、切剂子、擀皮、包饺子了。这顿饺子，我们小孩子是不能动手包的，用我奶奶的话来说，这是要给老天爷吃的，不能破皮儿。我们姐弟四个一会儿凑过去看看包得怎么样了，一会儿纳闷父亲他们贴好了春联，怎么还不去请祖宗。母亲见我们不停地跑来跑去，就会吼一嗓子，让我们安生点儿。但是，吃不上饺子，我们怎么能安生下来！非得等饺子下肚了，才能安静下来。等奶奶忙完，开始下一个节目。

下一个节目就该压岁钱上场了。吃完饺子，爷爷舒舒服服地卧在炕头上，忙个不停的奶奶也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气。这时，就可以谈压岁钱的话题了。总是爷爷先笑眯眯地逗我们，说：“谁给我拜年，就给谁压岁钱。”我们围着炕头上蹿下蹦地说：“我我我！”爷爷又说：“谁给我磕头，就给谁压岁钱。”我们四个二话不说，脱鞋就上炕，排成一溜儿跪在爷爷面前。爷爷满脸的皱纹都在笑，说，小狗头不值钱，一个头一分钱。话未落音，我们已经干净利索地给他磕了一个头。爷爷笑嘻嘻地把手伸进怀里去掏，没等把钱掏出来，我们一个个双手扶炕，撅着屁股不停地点头，边点边大声数着1分、2分、3分、4分、5分……随着数的数越来越大，爷爷掏钱的手定住了，脸色也变得慌张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不能再磕了！”但是我们不听，异口同声数数的声音更大了，爷爷彻底坐不住了，伸手拉拉这个，再拽拽那个，结果谁都不起来，嘴里还大

声说着94分、95分……爷爷大吼一声：“停！超过100个的都不算！”到了100，我们笑嘻嘻地伸出小手，爷爷一脸肉疼的样子。奶奶就在旁边抿着嘴笑，说，小狗头磕多了也值钱，老头儿，掏钱吧。只是爷爷永远都是小气的，也永远是说话不算话的，最后他给我们的也不过是一人一毛钱。后来我们还商量，既然10个头一分钱，那我们以后给他磕1000个，是不是他就会给我们一人一块钱了呢？可是，爷爷到底没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我们拿到钱，一骨碌从爷爷的大炕上下来，欢天喜地向母亲炫耀自己的压岁钱。母亲就说，小孩子拿着钱会丢的，都拿过来，我给你们保存着。于是，那一毛钱还没在我们手心里捂热，就到了母亲手里。具体她是怎么给我们保存的，我们谁也没问过，反正，这一毛钱再也没回到过我们手里。

压岁钱的游戏和爷爷玩了好几年，钱数也最终由一毛钱涨到了一块钱。等拿到手的压岁钱变成两块钱的时候，我已经上了高中，爷爷也老了。现在我们给下一辈儿的孩子压岁钱，动辄几百上千，不知道他们收到压岁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我们当年同样的喜悦。

和爷爷笑闹完了，午夜的饺子奶奶和母亲也包好了，我们飞快地跑到后院，我爸正在那里把炖好的肉从炉子上

端下来。看到我们进家喊他去前院吃饺子，他夹起肉，一人一块送到我们口中，拍拍手说，走啦！可是我们的眼睛被放在床上的新衣服吸引住了，就忍不住跑过去拿起来左看右看，再往身上来回比量，争论着谁的最好看。我爸长胳膊一伸，把我们一下子揽过来，像赶小鸡一样往外赶，说，着什么急，大年初一才穿新衣服呢，把新衣服摸脏了，你娘又该骂了。快去吃饺子吧，我看谁跑得最快，明天就让谁先穿新衣服。预备——跑！

话音未落，几个小身影已经箭一般射出去了。我爸得意地倒背着手，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。

吃过半夜十二点的饺子，我们向后院自己家走去。院子里挂在梨树枝上彻夜不息的灯笼在风中摇晃着，地面上总有巨大的黑影在无声晃动，我们便屏了呼吸，仿佛那个叫“年”的怪兽在院子里来回走动。不知道是谁突然跑起来，剩下的三个孩子也受了惊一样地跟上去。父母在后面笑出声来。

梦里，有鞭炮声此起彼伏。我们睡得香甜。新衣服就静静地躺在我们枕头边，急切地等着我们醒来，好穿上它们美美地跟着大人们到各家各户去拜年。



捡柴火过年

□ 刘晓东

小时候过年，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有一项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帮家里捡柴火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那时候的腊月，气温比现在低，有些路面会被冻得裂开一指宽的缝隙。北风刮到脸上、手上，就像小刀子在割肉。当时农村还没有通电，更没有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可玩，放了寒假的我们，一天到晚在家里逛来逛去。正愁怎么过年的家长被惹烦了，往往大吼着扔过来一个柳条篮子，让出去捡柴火。我们则屁颠儿地抓着篮子，呼朋唤友地集合起来，一路欢笑着跑向村外。

家长们让我们去捡柴火，不光是为了图家里清静，更主要的是过年需要大量的柴火来做饭。那时候穷，家里根本没有钱买煤烧。烧柴火既可以取暖，又

可以做饭，草木灰还能作为肥料撒在庄稼地里，堪称一举多得。秋天收集的那些柴火是不经烧的，尤其是快过年那几天，几乎每次做饭都要烧掉一大抱。如果柴火被雨雪打湿了，那就更没有可烧的了。小孩子们之所以不顾天气寒冷去捡柴火，不仅仅是能名正言顺地出去玩，主要是觉得快过年了，帮家长干点事情，就有机会多吃块儿炸藕盒。

光秃秃的田野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柴火等着我们去捡，家家户户都缺柴烧，近处的早就被捡走了，我们只得去远处的河坝看看。那里还有一些割剩的芦苇和别人不要的茅草，正好用来烧火做饭。上冻后的芦苇很脆，用手折或者用镰刀割时，会发出像鞭炮似的“啪啪”声，我们一边劳动，一边欢呼“过年了，放鞭炮了！”若是不小心，会被芦苇划破手。血滴在冰面上，非常鲜艳。不过没人会在乎那点儿小伤口的，找点岸

边的土涂在上面，照样有说有笑地干活儿，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篮子装满。

如果能遇到一棵枯树那是最高兴的事情了，支起油锅，开始炸年货时，将它填在锅底，火苗很旺，燃烧的时间很长。实在没有也没关系，我们会爬上高高的树，把上面干枯的枝杈掰下来，也能装满篮子。那些不会爬树的小伙伴只能抬起头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在大树上像个大将军似的欢呼。不过我们会学着收音机里所讲的梁山好汉那样，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把枝杈分给他们一部分，最后大家都会挎着装满柴火的篮子高高兴兴地回家。

偶尔我们也会在田地里翻到叔叔大爷们干活儿落下的地瓜。这时，我们便会围成一圈，捧来一些树叶或者杂草，将地瓜放在中间后点燃。等树叶烧完，地瓜也基本熟了。大家一人一口地吃着，弄得嘴角黑乎乎的，连皮儿都不

会剩下。烤地瓜虽好吃，和家里的炸藕盒比起来，还是略逊一筹。

过年的炸藕盒，除了上供外，还得招待客人，是不能随便吃的。我们把满篮子的柴火带回家时，碰巧遇到家长在炸藕盒，便会殷勤地帮忙烧火，还会自夸捡来的柴火多么好用。家长会不经意地把一块儿藕盒放在锅台边的空碗里，说：“尝尝炸熟了吗？”我们往往顾不得烫手就捏起来，放进嘴里一点点地咬着，品尝它的味道，舍不得咽下，感觉这就是过年的滋味。

现在生活好了，家里做饭除了用煤气灶，还有电磁炉，根本不用再去捡柴火烧了，可我总是怀念小时候自己捡的柴火炸出的藕盒味道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这种味道萦绕在我的心间，挥之不去，那是对童年、对父母的怀念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